

新儒家思想史

张君勱 著

弘文馆出版社

張君勳／著

新儒家思想史

弘文館出版社



◆ 究必印翻 ◎ 有所權版 ◆

新儒家思想史

定價 450 元

作者：張君勳

出版者：弘文館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復興南路二段144號之3 二樓

電話：七〇四一五一四

印刷者：復大美術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武成街35巷16弄15號

電話：三〇五九七三三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三八〇號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二月 日初版

目錄

「新儒家思想史」再版記	張敦華	一
序	恒慕義	三
再序		五
前言		一
第一章 導論：中國歷史上的儒家及其與西方哲學的比較		一
(一) 百家時期與各家並立的儒家		一七
(二) 前漢的儒家是最具特權和權威的派別		一九
(三) 儒家光彩爲佛道二家掩蓋		二〇
(四) 儒學的再生、所謂新儒學的文藝復興		二五
第二章 理學的基本原理		三九
第三章 理學所確立之政治及文化制度		五一
(一) 道統		五一
(二) 聖學		五三
(三) 經典		五五
(四) 書院		五七
(五) 爲政		六一
第四章 理學的先驅：韓愈		六九

第五章	韓愈的弟子：張籍與李翱	八九
第六章	佛教及於新儒家之刺激	九七
第七章	周敦頤之宇宙論	一七
第八章	邵雍與張載之宇宙論	一三五
第九章	宋儒哲學之理性基礎(一)——程頤	一五五
第十章	宋儒哲學之理性基礎(二)——程頤	一七一
(一)	程頤對合理性的信念	一七四
(二)	程頤性即理之說	一七六
(三)	程頤的雙重修身方式	一七九
第十一章	自程頤迄於朱熹之過渡時代	一八九
第十二章	集大成之朱子	一九七
(一)	朱子的幼年和青年時期(一一三〇—一一五四)	二〇〇
(二)	思想體系的完成與豐富的著述(一一五四—一一七八)	二〇〇
(三)	從政時期(一一七九—一一九六)	二〇二
(四)	晚年時期(一一九六—一二〇〇)	二〇四
(五)	朱熹的哲學體系	二〇五
(六)	理一之說	二〇九
(七)	分殊之說(或理與氣的關係)	二一一

(八) 人性：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	二一四
(九) 心與修身	二一九
(十) 對佛家的批評與儒家經書的註釋	二二三
第十三章 朱子與陸象山	二二三
第十四章 朱子與陳亮	二五一
第十五章 自宋末迄元初之儒家哲學	二六九
(甲) 朱派	二六九
(乙) 陸派	二七一
(丙) 朱陸兩派的溶合	二七五
文天祥正氣歌解	二八一
第十六章 明代哲學之特點	二八五
第十七章 王陽明	二九七
(一) 生平	二九七
(二) 哲學體系	三〇七
第十八章 王陽明與羅整庵湛若水之論辯	三二三
第十九章 王學之紛歧	三五一
第二十章 王學之衰落與日本陽明學之興起	三八三
第廿一章 東林學派劉蕺山及四部哲學史	三九七

第廿二章 明清交替與徐光啓……………四一五

第廿三章 朱舜水……………四二七

第廿四章 顧炎武……………四四一

第廿五章 黃梨洲……………四五五

第廿六章 王船山……………四七三

第廿七章 顏習齋……………四九五

第廿八章 回到程朱運動……………五一三

張揚園 陸桴亭 張武承 陸稼書 張伯行

第廿九章 考證學派戴東原……………五二七

第三十章 反對考證學派之先鋒……………五四五

章實齋 方東樹

第卅一章 會滌生之復興宋學運動……………五六一

第卅二章 西學東漸時代之思想界……………五八三

第卅三章 儒家思想復活之基礎……………六〇九

附錄 一：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六二一

——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

(一) 前言——我們發表此宣言之理由。

(二) 世界人士研究中國學術文化之三種動機與道路及其缺點。

- (三) 中國歷史文化之精神生命之肯定。
- (四) 中國哲學思想在中國文化之地位及其與西方文化之不同。
- (五) 中國文化中之倫理道德與宗教精神。
- (六) 中國心性之學的意義。
- (七) 中國歷史文化所以長久之理由。
- (八) 中國文化之發展與科學。
- (九) 中國文化之發展與民主建國。
- (十) 我們對中國現代政治史之認識。
- (十一) 我們對西方文化之期望及西方所應學習於東方之智慧者。
- (十二) 我們對世界學術思想之期望。

「新儒家思想史」再版記

赤鷲瀟蕩，神州沉淪。先父於卅八年春由滬遷居澳門，是年冬赴印講學，為時兩載，旋應美國友人之邀與港台親友之促，以美國為吾人今後反共重鎮，並思於國民外交有所盡力，效秦庭之哭。行前且有印尼、澳洲、馬來西亞之行，遍訪各邦政要，於四十一年四月始抵美。先父寓美期間，目睹世局大勢，省察中西雙方思想之異同，冀從根本上喚起西方人士對東方之了解，促其有所反省，乃有是書英文版之著。

關於西方對中國思想的衝擊，先父則在序言中留言曾說：「我們緊記着共產主義在中國之所以贏得追隨者，只是因為西方正統思想在中國沒有完成它應該完成的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此書乃於四十六年完成上册，五十二年出版下册，並將要點以中文在香港人生雜誌陸續發表。自美印行以來，深得外籍人士之熱愛，六十九年八月在台友人為紀念先父，有將是書譯成中文之議，乃由程文熙先生着手進行，奈因時間倉促，出處難免有誤，當時祇分贈少數親友並未正式問世。茲商江日新先生重新校訂，並將先父所記「新儒家思想史寫完以後」一文附後，委由弘文館出版印行，併為一冊，雖為再版實即初版也。承楊毓滋先生題籤，一併致謝。

張敦華識

民國七十四年八月

序

兩千五百年來，曾有過三個文化，對世界思想發生很大的影響，此即中國、印度及東地中海區，於不同的地理環境中發展，並溯源於遠古，它們中每一個，雖然程度不同，但遲早都強調一個基本需要。我們現在的世界，通過科學和技術，已成爲了地理上一體，這些文化中的任何一個，對整體的完成都有他的貢獻。對於西方於自然之不能匹敵的理解，現在我們能順利的加上一長列中國思想家在倫理學上和人際關係之藝術上的察知（Perception），及印度先知對超越於塵世之實體的不盡探討。

這三個探究雖然是同等有效的，並在他們領域內能獲得特殊的洞識（Insight），但是他們中沒有任何一個能正確的堅持他能單獨實現所有人的潛能，只有這三者和其他文化相互滋養，人類方能達到合一世界要求的新意識境界。

爲了促進一個中國偉大哲學——儒學——的更深入了解，張博士完成了這本書；爲表示這個主題最大的景觀，他借用了長列的新儒學思想家的眼光去檢討儒家發展的過程。新儒家們是在第八世紀開始他們再檢討的工作，而在十一、十二世紀開放出絢麗的花朵；直到現代，仍不斷有矚目的新學派和批評家出現。這個運動實際上遠超過了要復興儒家傳統的本旨；它在一種新意見的風氣下，做了重新整理、重新評價傳統的工作。這個風氣是經由兩個並驅的哲學：道家和佛教強烈影響下而生起的。道家是土產的思想，佛教則於西元一世紀後從印度傳入的，這些競爭系統有力的刺激新儒家去做新的思考，主要是提供給新儒家更豐富的「心理學字彙」（Psychological vocabulary），及開始強烈吸引他們，而終

使他們感到困惑的形上學。於此，他們回到自己儒家傳統偉大經籍上來做更深一層的研究，並以這新而寬廣的基礎重新解釋它們。

這個思想的騷動越過國界；由於使用共同的文字，這些新儒家的作品又傳播到韓國和日本，並且受到當地學者的閱讀及檢討。另外並行的學派和個別的解釋家興起，藉由他們的教學和著作，造成了在道德理想、教育、政治理論和人生形式上很大的影響。事實上，如果我們對這種運動沒有一些認識，則我們對韓國和日本在過去三百年的知識生活，便不能有正確的了解；所有這一切都是人心靈在這長期為攫獲人生堅固立足點的奮鬥中的一部分。對人際關係的認識，當我們朝向一個新紀元的曦光邁進時，沒有人能夠對其根基有那麼大的信心，而敢忽視中國思想家在這方面的貢獻：他們誠心努力界定人在社會中的責任，並使他們的道德研究又合理又能引人樂循：這確實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張博士是第一個人將這些新儒家的許多語錄和著作摘引譯成英文，並把一些有不同表達方式的語彙標準化，他的確為我們做了一項很重要的工作。至於印度思想怎樣以佛教的方式逐漸對中國人的思想引起了巨大的影響，張先生也清晰的指出了。另外一些中國不能接受的部分，也並未被忽視。張先生比較中國新儒家與亞理士多德和柏拉圖思想間的異同，不但將推理做得更清晰，而且也給讀者一種人類在根本上是同一的新鮮感受；更顯著的也許是張先生將新儒家與康德思想的比較，因為康德強調道德意志比理論悟性更具優先性，而使得他更接近於中國思想。因為對於中國人來說，哲學無論如何有用，並不單是意味理論的架構而已，而是發現德性如何能更完善的表現在人生上的一門學問。

恆慕義 (ARTHUR W. HUMMEL)

再序

張君勱

近代中國儒家思想之所以晦暗不彰，我以為有三個因素。第一是共產主義在中國大陸上的勝利。這是很難想像的事，兩種如此不相容的人生觀如何會一個獲得了勝利，而另一個仍可以生存。但此邦有些學者以為中國共產黨的獨裁，在某些方面與儒家傳統有關連的，却是很奇怪的事。如果共產主義歷史的本源可以找得到的話，這就是秦始皇帝的絕對君主制，藉著專制統治以達其權力慾與征服狂的目的。孔子觀念中的君主政制是基於人君愛護人民以及國家的和平和秩序。無論如何，倡說儒家思想和本質上含有階級鬥爭、一黨專制、唯物辯證法，以及世界革命的共產主義有關連，顯示觀念上有大錯誤。毛澤東沒有公開非難儒家思想雖是事實；但這是因為他從歷史上得到了教訓，當太平天國革命時洪秀全成爲中國知識份子最討厭的人物，就是因爲他非難儒家思想。毛澤東企圖完全依照馬克斯的觀念改變中國社會則是無疑的。

第二個因素傷害儒家思想已有一世紀之久。大約從鴉片戰爭時開始，基督教傳教士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嘗試以基督教的觀念去代替儒家傳統。他們這種努力的結果如何？現在就從精神上的價值去作一個評斷尚屬太早。人們或許可以說，就現在可見到的結果有消極與積極兩方面。但在此不去詳加衡量了。其使個別的中國人，尤其是使不少受教育的人士淡視他們自己與其文化間不可分的感覺，則是不可忽視的現象。

第三個因素則是一少部份中國知識份子自覺的去摧毀儒家的傳統，關於這一點我於本序言中將略多

說幾句。有兩個人的名字常與這一運動有關。一個是鼓勵共產黨的陳獨秀先生，另一個是約翰杜威的門徒胡適博士。當這兩個人在早期緊密的合作時，胡博士鑄造了一個「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並獲得了若干程度的成功。他的主要的論題是中國文化的傳統要推倒和讓位於科學的人生觀。他說科學的人生觀不單要應用於倫理學及形而上學上，同時亦應用於中國的社會制度上。不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他開始讚揚宋代的儒者，但他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宋儒為人的良心的自由而作戰，並不是因為胡氏接受他們的儒學立場。胡博士現在仍堅持他原來的觀點，這點我們可以從他最近在美國西雅圖中美文化協會所宣讀的論文上見到。「中華傳統和它的未來」沒有否認儒家人文主義的價值，但胡適博士在那演講內要強調的是清代學者語言學工作上的價值。那對他是「證據的探求」，這是科學的方法應用的結果。

要了解胡博士的立場，須要追溯到約翰杜威的實驗主義，因為他的立場是由此而來的。杜威敵視西方理性主義是人所共知的。他在「哲學的重建」一書中說：

「『理性』作為與經驗分別的一個心理機能，引導我們到一個超越的普通真理，現在對我們已成為疏遠的，無趣的，和不重要的。『理性』如康德派之所持而視為引導普遍性與規律性於經驗中的心理機能，對我們越加成為多餘的——成為在傳統的形式主義和費力的術語名辭之上所增附不必要的創作。」（註●）

這似很清楚地表明了杜威對於理性的態度。但當康德堅持謂「知識始於經驗」時，人們有權利去問杜威是否適切地了解了康德。在同書另一地方杜威表明了他的觀點：「理性作為被歷史上的理性主義所運用言，已傾向於不小心，自誇，不負責，和嚴厲——簡言之就是絕對主義。」（註●）主張理性主義引導至絕對主義，最低限度說，是一種過份的言論。康德，笛卡兒，和斯賓諾莎都是運用理性主義去反

對杜威所非難的眞正絕對主義，故他們任何一人都不能被控告爲絕對主義。杜威如此的輕視理性主義好似就是胡博士用來作爲他衡量儒家和新儒家思想的武器。和杜威一樣，胡博士亦以爲「自然科學方法和結論是適用於道德理論和實踐的」〔註①〕，我堅決地否認這一觀點的有效性。這種科學萬能和科學方法萬能的觀點，胡博士早在一九二三至二四年當科學與玄學之價值被熱烈的討論時曾大力予以提倡。那時我反對他的立場，現在我仍然反對。但是我們應公平的說，儒家思想在胡博士開始打倒它之前，久已有衰落之象了。

無論如何，正如在人的生命有一種節奏，在人類的思想中亦是一樣，人類的思想有永久存在的性質者，當適當的時間來臨時將要復活。在整個中古時期柏拉圖差不多完全被遺忘，亞里士多德被置之不問，但不管如何的用力去壓抑他們，他們是不能永遠地被壓抑的。當他們的著作於君士坦丁堡被發現，並被翻譯時，隨著來的是一個經典思想的復興，這一直延續至今日。

我覺得儒家思想亦是如此。在香港由錢穆先生與其同事唐君毅先生所領導的對儒家思想的重新評價和重新信仰的一個中心已被建立。由王道先生在香港所主辦的「人生」期刊成了這一運動的一個重要機構。「中國文化宣言」一文，於兩年前已經由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徐復觀先生和我自己共同聯名發表，並已翻譯成英文附錄本書之末。這些都是儒家思想將獲得新的承認和盡量地規範中國人或全世界的生活和思想的本份的一些顯示。〔註②〕

在結束這序言之前，讓我重覆我在序言所說關於西方對中國思想的衝擊。在那裏我曾說「我們謹記着共產主義在中國之所以贏得追隨者，只是因爲西方正統思想在中國沒有完成它應該完成的這一點是重要的。」本書「西學東漸時代之思想界」一章，是試行指出這一失敗是如何招致的。如果只是西方的重

要的科學和技術的進步以及民主的政府和行政管理的演進被中國思想家所認識，沒有不幸地伴隨著侵略或帝國主義的形式而來的痛苦和怨惡，中國的情形會完全不同的。如果中國去了解西方如去了解佛教一樣，那會有一種接納的心靈，一種友誼的反應，此可能有很好的效果。那將沒有讓異端的共產主義入侵的地方。實際上，整個十九世紀社會在西方在政治上對中國的衝擊與在西方文化上和精神上對中國之衝擊，同樣是毀滅性的企圖。它要求中國的傳統的價值被擱置下來，或甚至失去其自身之同一性。那就是爲什麼學者們在研究中國歷史時採用一種、相情願的以博物館中的死物爲材料所需要的研究方法。結果是本當友誼地合作和樂意的接受的地方，竟以敵對、破毀、以及抵抗的態度對付之。（編者註）

我很樂意再次表示，對許多朋友對本書出版所給予我的幫助感謝之忱。他們慷慨的花那麼多時間幫忙我，而本書的看法仍應由我自己負責。感謝國會圖書館東方部門的同仁，特別是吳博士（Dr. K. T. Wu）和他的同事，他們特別給我許多幫助，蘇特博士（Dr. Rufus Suter）經常鼓勵我，使我工作較愉快，他的西方哲學知識和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事實上對我也很有幫助。

我深深的感謝能經常得到老朋友張歆海博士的幫忙，他是菲爾賴狄更生大學（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的人文科教授，他在這本書的每個準備和寫作過程階段中，於時間上無限的幫助我，並在困難事上給予幫助。他東西方歷史上廣博的知識，對我的計劃，是很多靈感的泉源，倘若沒有他的幫助，我敢說這本書將很難完成，其他的我就不用再說了。

甚至張博士能在一個危機中，跳進混亂裏頭，答應書寫附錄和參考書目的中文字，以消除緊張。事實上，我一直記得馬爾庫斯·徐留斯（Marcus Tullius）的話：Quam multa enim quae nostra causa numquam faceremus, facimus causa amicorum。（有多少事對我們爲朋友而作，對